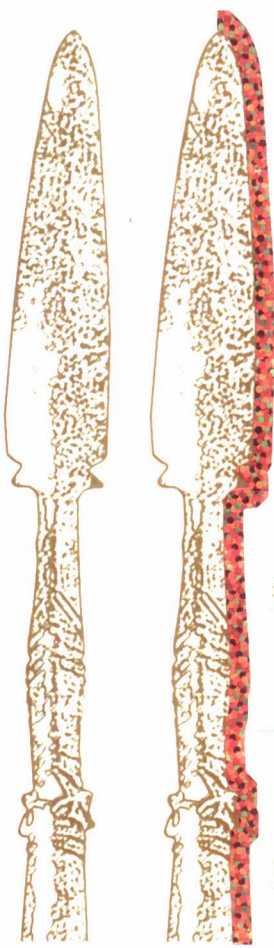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悦读 恒久珍藏



庄 坚《春至今归故乡——春节记》

李 零《孔子符号学索隐》

苍 耳《一个人的墓史》

余秋雨《诗人是什么》

王培元《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周健森、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2007
中国年度
随笔

◆ 漓江出版社



2007
中国年度
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中国年度随笔/杜渐坤, 陈寿英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8.1

(2007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007-8

I.2… II.①杜…②陈…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3096号

2007中国年度随笔

选 编 杜渐坤 陈寿英
责任编辑 文龙玉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田 芳 甘智洪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95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4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007-8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许纪霖 (1)
- 火烧圆明园 周健森 沈衍琪 (5)
- 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 诗人是什么 余秋雨 (17)
- 一个人的墓史 苍耳 (27)
- 张学良读明史 王充闾 (36)
-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王培元 (48)
- 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资中筠 (62)
- 被贬低的思想 景凯旋 (66)
- 春至今归故乡 于坚 (75)
- 春节记
- 关于人的生死观 吴江 (85)
- 节日变形记 耿占春 (93)
- 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钱理群 (99)
- 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 孔子符号学索隐 李零 (105)
- 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 李木生 (115)
- 经典的魅力 老城 (120)
- 青铜散 吴克敬 (131)
- 二十一世纪，仍会是一个美国世纪吗？ 孔诤烽 (145)
- 以自由民主之名 盛孝玲 (152)
- 1945：波茨坦与重庆的外交内幕 李辉 (156)

-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刘 柠 (161)
- “人情美”的陷阱 木桃心 (168)
- 当粮食遭遇政治 河 西 (172)
- 被劫持的村庄 张浩文 (178)
-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韩少功 (188)
- 大学“精英教育”为何陷入尴尬 熊丙奇 (196)
- 《新人口论》五十年祭 马大成 (199)
-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冯骥才 (205)
- 面向时代的文学 陈建功 (217)
-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卢周来 (225)
- 杀人杀在菜市口 崔济哲 (234)
- 李斯：一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人 张大威 (242)
- 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 唐浩明 (249)
- 说《大诰》 王学泰 (255)
- 话说“裙带风” 李国文 (264)
- 中国传统士民的“臣妾心态” 李元洛 (271)
- 元曲之旅
- “国学”问答 朱维铮 (279)
- 有声的中国 陈平原 (286)
- “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 大美者无言 舒 婷 (298)
- 《李锐家书集》序 朱 正 (307)
- 流在剑上的酒与浸过酒的剑 蒋 新 (311)
- 想起了少年维特 叶兆言 (315)
- 斜塔春秋 廖德全 (319)
- 读史六篇 徐怀谦 (326)
- 老戏新眼 孙 曙 (338)
- 大海航行靠自己 田炳信 (343)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许纪霖

“9·11”：21世纪的开端？

“9·11”事件已过去5年多。这一事件对我个人来说具有很特殊的意义，那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和美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我就在波士顿，甚至存在一种可能——成为恐怖事件的牺牲品。9月初，我想去黄石公园旅游，计划9月11日坐飞机从波士顿到洛杉矶，如果这样，很有可能坐上撞毁世贸大楼的班机。但阴差阳错，在最后办理时那个航班名额已满，于是提前一班出发。在黄石公园，我听到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后我从洛杉矶回波士顿，恰巧搭上“9·11”之后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恢复开放的第一个航班。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电视台全部出动采访。我突然感觉到，“9·11”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美国坐飞机，就像英雄一样。感恩节我又去纽约，尽管离“9·11”惨案已过去两个月，但现场的情景仍然令人恐怖。这种冲击是无法在电视和照片中得到的。你会真切感受到，人类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创伤——创伤的伤口直到今天还在发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9·11”对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想起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0年刊载的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教授的文章，其中谈到：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并不是以一个自然的时间开始，而是以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为标志。在他看来，20世纪开始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21世纪开始的标志是什么？他当时没有说。“9·11”以后，金教授给我打电话：“21世纪开始了。”听了这句话，我同样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纪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繁荣、和平、发展、富强，而是带来一种新的自相残杀的恐怖？是否“9·11”意味着一个新世纪的恶兆？

环顾四周，我们的确可以看到，“9·11”以后的这几年，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反是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战争、冲突、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弹”……“9·11”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整个人类。我们不得不从“9·11”事件的本身来反思，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连绵不绝的恐怖主义和战争？为什么整个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文明冲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9·11”以后，网上有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宣称“9·11”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反文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但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在一个所谓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里，依然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野蛮的本性却随着现代性在继续蔓延？难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恶总是与善在并行发展，同步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恐怖主义？是不是我们简单把它定性为“野蛮”，问题就能解决？哈贝马斯在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演讲词里说，“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深处一根宗教的神经”。也就是说，这个世俗社会意味着全球化，整个现代化发展到了任何一个角落，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部落，你是什么文化，你相信什么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水准，现代化都极大地改变了你原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它把资本主义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以及现代的人际关系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与很多地区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现代化的拥护者原以为现代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现代化无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宗教所提供的，现代性也无法回应人们的一个集体认同的问题。整个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大家看的是同一个好莱坞电影，享受的是同一种生活，穿的是同一个名牌，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人的心灵深处的信仰问题，也无法解决人自身的认同问题。这些信仰、认同显然无法从这样一种普世化的世俗意识形态中寻找答案，它还得回到原来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传统里寻找。在世俗化社会里，宗教问题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越来越尖锐化。

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私人选择，公共生活并不给你提供标准的答案，问题在于，人生的意义个人是无法解决的，宗教的问题永远是一个与公共生活

有关的问题，但是现代性却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使得个人更处于某种孤独、彷徨之中。他们要在公共生活、集体生活中重新寻找他们的依归。所以，在世俗生活里宗教问题重新以另外一种形式日益尖锐化。

文明对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管我们的心灵多么善良，希望文明之间不应该或者不会有冲突，但是文明之间不同的宗教、文化由于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很多分歧。

文明与文明之间存有巨大的裂痕，在终极的价值上很多是不可通约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就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资讯一体化，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观察、对自身意义理解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在历史的表层，世界像网络一般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深层，彼此间有着不同的“根”，这些根与根之间没有关联，甚至互相很陌生，没有基本的对话。21世纪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彼此更需要连接在一起。比如中美之间的依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中国离不开美国，同样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美国一家媒体报道，如果没有中国，圣诞节美国人都要“光屁股”了，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Made in China”。但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缺乏真正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其他文明，其他的文明也无法理解我们，换言之，文明之间缺乏对话和沟通。

这些年，关于文明的对话，全世界很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工作。联合国把2001年命名为“世界文明对话年”。我到联合国大厦参观时，就看到一张大幅宣传画，上面用各种语言和文字标明了一个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最低伦理准则，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的“恕”道。虽然是消极的，但具有普遍性，能够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宗教和文明所接受，也是它们的重叠共识。在普陀山度假，我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饱读佛教经典的大法师。第二天他见到我，很兴奋地说，在佛教经典中也有这样的思想，他翻开一本佛经，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听：“非己所安，不加于物。”可见，联合国将这一条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点，焉有深意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文明对话年”，发生了“9·11”事件。

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光明的世纪，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界究竟出

了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虽然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然而人们却仍然面对着一系列严峻的危机。支配整个世界的仍然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这个世界并没有理性。虽然有联合国，有各种人权宣言，但缺乏有效的约束性建制。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恐怕与当今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法则有关。

今天，世界越来越成为“地球村”。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外，大家还有着公共利益。这一公共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按照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的理想状态，认为只要有了一套健全的市场规则，自然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个人利益。推广到国际关系方面，好像也只要有一套规则，就可以调节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但是整个20世纪的灾难一直到“9·11”事件，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每个国家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话，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经济学的“囚徒困境”证明了，假使大家只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后所能达到的，并非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人都考虑到公共利益，反而有可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合作要比不合作好”的道理。在国际关系中也是这样。既然大家都在地球这个“诺亚方舟”里，就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这就要求每个国家放弃一部分利益特别是次要的国家利益来照顾和维护全球的公共利益，这样才有建构安全与秩序的可能。

要使大家都放弃一部分国家利益，强国首先要有所表率，因为强国的利益最多，它可舍弃的东西很多，选择空间较大。作为弱国和穷国，它可以舍弃的东西很少。但在这方面，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令人恭维。

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更需要公共的规则、共同的正义以及最底线的共同伦理。只有具备了这些，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永久和平，人类才有希望生活安宁。

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选自《同舟共进》2007年2期）

火烧圆明园

——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周健森 沈衍琪

公元1860年10月5日晚，北京西郊的皇家夏宫圆明园，闯入一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这一年是清历咸丰十年。英国人撼动南疆大门的隆隆炮火，已在耳畔断断续续回响了20年；此时英法联军又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名，从北塘登陆，攻下大沽口炮台，长驱直入占领天津，沿北运河一路进发，步步逼向北京。

战战兢兢地度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圆明园年轻的主人咸丰皇帝早已如惊弓之鸟。这个原本夸口“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张挞伐”的天朝统治者，半个月前便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守卫圆明园的清军也已纷纷溃散。

此时的圆明园，纵然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却几乎成了一座寂寥的无主之地。

进犯京城的英法联军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随行者——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在十余天的时间里，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

黑云压城

沃格曼是《伦敦新闻画报》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

诞生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的新闻周刊。它的创办者赫伯特·英格拉姆当初在经营报刊零售生意时发现，那些刊载了较多图片的报纸，销量总是更好。这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画报的念头。

巧合的是，《伦敦新闻画报》恰好诞生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夕。遥

远的英伦之岛不曾被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所熏染，但远东地区的战况局势，西方人眼中那个数千年来迷雾深锁的大陆国度，立即被纳入这份刊物报道的视野范围。

然而，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倨傲自负的态度一样，《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古老中国的最初印象，充斥着对异己文明的藐视与误读。

1842年6月4日，有关中国的第一篇报道中，刊载了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他披挂龙袍、身形佝偻地坐于椅上，面孔被描绘成眼眶深陷、鹰钩鼻的典型西方人形象，眉宇间流露出凶残与贪婪的神情。英国人凭空臆断说，这个皇帝的政治地位在战火中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则介绍清朝赴英使臣的图画中，《伦敦新闻画报》将其丑化为一个形容猥琐、举止古怪、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画报还配了一首蹩脚的打油诗，嘲弄说当人们带他参观军火库时，这个自以为是的官吏被吓得两腿发抖。

至于在战争中与英军交火的清朝兵勇，有时被贬低为“坐在用猪皮吹起的筏子上，裤管卷到大腿根部，手执三叉戟和火绳枪，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作战”的劣等族群；有时又被误画作一身中国传统戏曲装束，腰挎大刀、摆弄土炮的不伦不类形象。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演进，这种谬误百出的报道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画报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即将起程前往中国，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

尽管摄影术早在1839年便已发明，如何将那些相片大量印制于纸面上，在当时仍是个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通常是交由专业画家临摹成版刻作品再进行印刷。为了确保画报的品质，《伦敦新闻画报》聘请了当时英国一流的艺术家作为记者，沃格曼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每周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

在广东采访期间，沃格曼结识了他的同行——来自意大利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来中国之前的两年间，作为战地摄影师的贝阿托，一直在印度北方拍摄叛乱新闻。他的摄影技术曾得到英军陆军司令克灵顿的赞赏，并因此得到随联军进入中国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在沃格曼和贝阿托各自的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

身影。一张于1860年4月在广州孔庙前拍摄的照片中，沃格曼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张望，贝阿托则斜倚着栏杆。而在另一张写生作品中，沃格曼和贝阿托坐在一群好奇围观的中国人中间，神态安详。

然而这被镜头和画笔永久铭刻的宁静时光，在被战争蹂躏之下的历史长河中，短暂得如同稍纵即逝的泡沫。当月，由18000余名英军和7000余名法军组成的联军，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从广东一路北上占领浙江舟山；随后又分别占据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

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来。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一役，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出其不意下令开火，企图突袭炮台的英法兵舰狼狈地折戟于海滩深泥。中国人的胜利，刺痛了欧洲人高傲的自尊，他们叫嚷着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

1860年8月12日，在占据了未设防的北塘之后，联军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在咸丰皇帝一纸“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的谕示下，“精锐耗竭”的僧格林沁被迫选择了撤退。

14日，塘沽被占。

21日，大沽失守。

24日，天津陷落。

名义上，英法联军是打着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而来，并希望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提高赔款数额。但在见到前来议和的大学士桂良之后，他们断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退兵要求，并质疑这位钦差大臣的全权代表身份，拒绝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9月初，联军继续向西进犯。一路蔓延的战火，距离北京已不过是咫尺之遥。

风云突变

北京城东约20公里处的通州，御守大清帝都的最后一道阵地。

在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的眼中，这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城。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座十三层高的宝塔俯瞰着这城墙环绕的市镇。他甚至因为目击了联军的抢劫行为而感到歉疚。但与一个月后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洗劫相比，这罪行不过是一次预演。

初秋时节爽朗的天气，恰好衬托了联军官兵的心情。咸丰皇帝派出了皇室成员怡亲王载垣前来议和；而联军的代表中则包括英国外交官巴夏礼，一位

在华任职多年的“中国通”。谈判的胜局似乎早已唾手可得，战争很快便会终结，因为清政府此前已经表达了让步的意愿。

喜悦的氛围在联军队伍中弥漫。没有人觉察到，遮天蔽日的阴云已在城外密布集结。

9月17日上午10时开始的谈判，前后持续了7个多小时。临近尾声，巴夏礼等人突然提出，英使抵京后，必须向皇帝当面呈递国书。欧洲人认为，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外交礼节；但钦差大臣们则将其视为外夷的狂悖，当即提出抗议，谈判再次濒临破裂。

这一节外生枝的事件令形势急转直下。18日，英法联军大营中的沃格曼听到了一则令他深感震惊的消息：巴夏礼等人在返回营地的途中，被清军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直至当晚，英法双方有39人失踪，这其中既有军人和外交官，也有随行的文职人员。

究竟是谁炮制了这起出人意料的“绑架人质事件”，众人莫衷一是。骑兵部队属僧格林沁的部下，联军统帅额尔金和葛罗将全部的罪责，都归咎于这位宿敌的“背信弃义”。其他人则猜测，此事系怡亲王一手操纵，据说在谈判桌上，他被巴夏礼傲慢放肆的言行所激怒。

从焦急惶恐转为愤怒的联军，终于显露出杀气腾腾的本色。当天，他们洗劫了大营的驻扎地张家湾，通州陷落。21日，清军与联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正面交锋，鏖战三四个小时，战况惨烈。次日，咸丰皇帝仓皇逃离门户洞开的北京，只留下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

10月5日晚，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人去楼空的圆明园，落入联军先头部队的手中。

远在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读者，是通过特派记者沃格曼的详细描述，来获悉战事延续的情况。与血肉横飞的战争相比，他们似乎更关心那些人质的命运。按照沃格曼的记录，被劫持的联军战俘被分成5组，关押在北京周边的不同地方。

肇事者巴夏礼最为中国人所痛恨，但是他却得到了最好的待遇。他与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五名法国外交官和一名锡克族骑兵被囚禁于北京城内，很快于10月8日交还英军司令部。其他战俘则押往圆明园，随后被捆绑手脚扔上马车，趁夜色转移至西北郊的偏僻山区。

第一组战俘包括德诺曼、费恩骑兵团中尉副官安德森和六名印度骑兵，其中只有四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

第二组战俘由三名法国人和五名传令骑兵组成，两名法国人和一名骑兵先

后死去。这两组中的幸存者于12日被送回英国人手里。

第三组战俘中，不仅有皇家龙骑兵下士菲利普斯、一名法国人和四名传令骑兵，还包括沃格曼的另一位同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只有两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并于16日回到英军营地。

第四组战俘则有三名法国人和四名印度骑兵，他们全部死亡。

另外还有两人，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教士，他们均告失踪，至今仍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线索。有后世学者猜测，他们应该已经被清军释放，但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到溃散的散兵游勇，并有可能因此而丧命。

战俘的尸体被成殓于棺材中，由中国苦力抬往英国司令部。最后一批尸体于17日送达。联军官兵在检视尸体时发现，由于长时间没有被松绑，战俘们的四肢出现了坏死的迹象，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

当晚，英法联军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沃格曼在报道中写道，英法联军决心要用“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那是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手段：“一把火烧掉圆明园。”

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已隐约笼罩在了一代名园上空。

暮都晚景

作为随军记者，沃格曼是于10月13日跟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

在实施那个可怕的报复行动之前，英法联军以炮击屠城相威胁，迫使清政府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北京城城门之一——安定门。

北京，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被誉为“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都城”。

1793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曾经用精细的笔触描绘过这座被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所环绕的城市。壮观的瓮城和高耸入云的城楼，护佑着安居乐业的子民，西直门内外车水马龙，繁华的胜景仿如梦境。

10月13日，当沃格曼步入安定门时，他深深地为这个雄伟的建筑所倾倒，在他发回《伦敦新闻画报》的文章中，震撼与惊愕表露无遗。

用“门”这个词来描述上面这个结构复杂的建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走近高达40英尺的厚实城墙，并穿过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时，你就会来到一个堪称“半圆形棱堡”的瓮城前……我们对于屋顶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齐的琉璃瓦已经十分熟悉。

他“沿着一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木制楼梯”登上城门上的一排阳台，“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北京的全貌，因为外国人是被严禁进入这最后一道城门的”。一条南北朝向的宽阔大街在他面前延展开来，聚在街上的北京市民，正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异乡人。

从广州一路北上的途中，沃格曼的目光总是从战事中游移开来，去捕捉那些令他产生浓厚兴趣的风土人情。他细致地描绘过岭南的采茶女、广州的商船、鞭笞小偷的刑罚、农历春节的年夜饭……这些有关中国的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曾在英国掀起持续多年的“中国热”。

初入北京的沃格曼，对于这里的市井民风倍感好奇。他惊讶地发现，北京“拉车的骡子或小马都很有灵性，马夫单凭吆喝就可以驾驭它们……中国人怜惜牲畜的程度和驯服它们的能力简直令人吃惊”。

在他的报道中，沃格曼告诫西方读者，把衣服交给中国人洗涤之前应当仔细叮咛，否则那些洗衣的姑娘会用洗衣棒把衣服的纽扣砸得粉碎；琉璃厂的古玩市场也是个必须警惕的地方，这里的商贩会用赝品欺骗初来乍到的外国人。

他曾经走进官宦人家的宅院，体察北京人温馨的家庭生活：女人们在长者的带领下做着精细的针线活，纳鞋或者缝制衣服的褶边，小姑娘安静地编制细长的丝绸穗带；男人们则一边品茗一边聚精会神地在棋盘上对弈；有时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分享各种美味的糖果糕点。

沃格曼笔下的北京人，显得过于闲适安详，远离战争的阴霾。在临摹街头茶馆的插图时，他感慨道：“这些茶馆并不像巴黎的路边咖啡馆那么格调高雅。北京的市民们酷爱泡茶馆，他们有的——边品茶，一边凝神注视着街上的情景，有的嘴里叼着烟杆，跟别人聊得起劲。”

“有一个男人手里用木棍举着一只鸟，端坐在中间那个茶桌边。”这样的场面与威廉·亚历山大在67年前绘制的作品如出一辙。“中国人更喜欢这样把鸟带在身边，而不喜欢拎着鸟笼。在鸟的翅膀下面拴着一根线，这样它虽然有活动的自由，却不能从主人身边逃走。”

好奇地领略北京风土人情的同时，沃格曼也以一个随军记者的眼光，从旁打量着因为失去了君主而有些惶恐的北京人。他们被一条拉紧的粗绳远远地隔离在20米开外的地方，一些手持皮鞭的衙役将凑上来的好奇者驱赶开来。在荷枪实弹的欧洲士兵面前，人们的神情明显带有几分疑惧，而未知的命运更令他们感到不安。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英法联军已经征服了这座古老的城市。他们在城内到

处张贴告示，作为对清政府的最后通牒。还在城门前竖起两块牌子，张贴着用蹩脚中文写就的布告，上面不仅标榜着令人瞠目的战争赔款数额，还无耻地将那个野蛮残暴的计划昭示天下。

还是有几个胆大的小贩，借机向站岗的联军士兵兜售他们的鸡鸭、水果或蜜饯。警戒线之内只有一两个中国人，他们正手拿纸笔认真地誊抄英法联军张贴的公告。沃格曼曾经多次在北京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是当时官办媒体《京报》的记者——沃格曼的中国同行。

与沃格曼同行的贝阿托，也登上了安定门的城楼。那些令沃格曼着迷的异域情调，从他的镜头中被过滤掉，还原为另一种更加冷峻的现实：厚实的城墙笔直地延伸向远方，残垣断壁的角落荒草丛生。远处散落着几个零星的帐篷，据说驻扎着搭建临时炮台的英国皇家工兵。

两门老旧的大炮如同静默的古兽，静静地蛰伏在开始坍塌的墙垛上，一个神情沮丧的清兵疲惫地坐在旁边。对于这个守卫者来说，那些大炮原本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武器。但此时，在侵略者的摆布之下，它们却已经调转过身，将黑洞洞的炮口瞄准这座古老都城的心脏……

故园惊梦

公元2000年，一张刊载于北京媒体上的照片，在史学界和建筑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照片中展现的是一座精致典雅的中式楼阁，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树丛间。根据照片底片上标注的文字说明，拍摄于“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圆明园被烧毁之前”。然而这座楼阁的造型看上去是如此陌生，即使是专业学者也无从解读其来源和背景。

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贝阿托；与他同时出现在现场的，还有沃格曼。

在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笔下，圆明园是“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

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他在致英法联军中的法军上尉巴特雷的信中写道：

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

雨果只能在想像中构建的这片辉煌建筑，沃格曼却有幸身临其境。

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内昭告“烧毁圆明园”的第二天清晨，英法联军的队伍向圆明园进发。沃格曼跟随英军的一个师步入这座闻名世界的帝王宫苑，沿途所看到的景色目不暇接。他一边忙不迭地用画笔为那些亭台楼阁绘制最后的形象，一边用文字描述道：

……那天早上，圆明园湖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那个湖的周长约有五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树林，在树丛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座造型优雅的宝塔，或是风格奇特的庙宇。在这些树丛的上方，矗立着一幢庄严雄伟的楼阁……它高耸入云，方圆几英里之外都显得非常醒目。

在湖的另一边是一座典雅的石拱桥，连接湖中的一个小岛，岛上的树阴丛中有一座雕梁画栋的凉亭，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在湖的西北面有一群小山丘，那上面庙宇林立；远处是冈峦起伏的群山，有的山上还堆积着白雪，作为一种雄奇的背景，更加衬托出夏宫的妩媚。

几个小时之后，这世间罕见的美景将在熊熊烈火中化作一片乌有。

早在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圆明园的第二天，10月6日，沃格曼便听闻，一些园子里正在发生零星的抢劫事件。在随后的十天当中，抢劫活动开始逐渐蔓延到了西面万寿山的清漪园，现今颐和园的前身。

何止是这两座园林。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以及畅春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依西山山脉之势，以长河、玉河贯通，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彼此相互衔接，形成规模空前的园林建筑群。而在侵略者的粗暴践踏之下，它们无一能够幸免于难。

10月18日下午2时，园内风景突变。

“从圆明园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方向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风助火势，不一会儿就从浓烟中蹿出了明亮的火苗，园内的宫殿、庙宇和亭台楼阁都陷入了